



新文化运动中的唯物史观派

李维武

摘要:新文化运动中的唯物史观派,是由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集合而成的革命家兼学问家群体。这个群体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学理上对唯物史观展开了不同维度的阐释:李大钊从历史学维度阐释唯物史观;陈独秀从政治哲学维度阐释唯物史观;蔡和森从人类学古史研究维度阐释唯物史观;李达以《现代社会学》建构唯物史观中国化表述体系;瞿秋白则从唯物史观走向辩证唯物主义。他们的这些工作,开启了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以一种新形态的现代中国哲学推进了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代表了自新文化运动后期发展起来的新的中国学术方向。

关键词:唯物史观派;新文化运动;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李达;瞿秋白

中图分类号: B201;B261;B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17)04-0026-22

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唯物史观派,是从学派划分和思潮分合的意义上,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及其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一种称谓。在中国数千年学术史上,这是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命名的学派及其思潮,由此开启了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以一种新形态的现代中国哲学推进了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促成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改变了现代中国的思想空间和学术格局。然而如何看待唯物史观派在中国学术史上的作用和地位,长期以来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眼中,新文化运动旨在“反传统”,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大破坏,根本就没有什么学术贡献可言。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新文化运动确实取得了重要的学术创获,但这些成果主要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学人所取得的。至于唯物史观派对新文化运动的学术贡献,则很少为人提及、予以阐发;即或有所论及,也往往大而化之、语焉不详。这样一来,在不少人心目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一群破坏有余、建设不足的革命家,哪有什么学术贡献可言?更有甚者,从意识形态的偏见出发,指责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干扰了新文化运动,中断了中国学术文化原本正常的发展。胡适就认为:“从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我们那时可能是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是它终于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①他所说的新文化运动“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就是指1919年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出现分化,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和参与者转变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唯物史观自此对中国新思想新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主导性影响。这样一来,如何看待和评价唯物史观派的学术思想及其贡献,就成为今天反思新文化运动、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必须面对和回应的重要问题。

^①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55.

一、“唯物史观派”名称的由来

唯物史观派的出现,是与唯物史观作为一大思潮在中国思想世界崛起相联系的。1915—1924年的新文化运动,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在新文化运动前期,主导这一运动的哲学思想主要是进化史观、民主思想和科学主义。在新文化运动后期,主导这一运动的哲学思想则发生了重要变化:以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为起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在中国思想世界大规模传播,由此产生了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由于受到理论来源和知识背景的限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主要局限于唯物史观,以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内容。自此以后的10年间,唯物史观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题。直到20世纪30年代唯物辩证法运动的兴起,这一主题才转换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

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派”这一名称,作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称谓,使之与其他学派及其思潮相区分的,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邓中夏。1923年,他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一文中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学派划分和思潮分合进行了考察,指出:“新文化运动者后来也分了家,演成两派:我们替他们起两个名字,一个叫‘科学方法派’,一个叫‘唯物史观派’。前一派的巨子是胡适之、丁文江、杨铨等,后一派的巨子是陈独秀、李守常等。科学方法派大概都是学过科学的,他们的态度,第一步是怀疑,第二步是实证(拿证据来);他们的主张,是自然科学的宇宙观,机械论的人生观,进化论的历史观,社会化的道德观。……唯物史观派,他们亦根据科学,亦应用科学方法,与上一派原无二致。所不同者,只是他们相信物质变动(老实说,经济变动)则人类思想都要跟着变动,这是他们比上一派尤为有识尤为彻底的所在。此派现在不仅是努力文字宣传,而且从事实际活动呢。”^①在这里,他把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称为“唯物史观派”,并进而阐明了唯物史观派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形成、主张与地位以及他们既是学问家又是革命家的特点。由此可见,“唯物史观派”名称早在新文化运动中即已明确提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唯物史观派”作为自己的共同称谓,旗帜鲜明地标示出自己的学派和思潮,用今天的话说,正体现了他们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唯物史观派包括哪些主要成员?邓中夏在这篇文章中,借用后期墨家的说法,称陈独秀、李大钊为唯物史观派的“巨子”,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领袖人物;他还谈到自己也属于这派成员,称“作者自认不讳,亦是相信唯物史观之一人”^②。至于这派的其他人物,他没有再作列举和说明。以后研究者所说的唯物史观派,从活动时间和主要成员上看,实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唯物史观派,指1923—1924年科学与玄学论战中,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参与论战,由此所形成的与玄学派、科学派鼎立而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广义的唯物史观派,则是指新文化运动中,由赞成、信仰和传播唯物史观并使之中国化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集合而成的群体。这个群体以唯物史观为共同的思想旗帜,其中大多数人积极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和早期活动,兼有革命家与学问家的双重身份。广义的唯物史观派包括了狭义的唯物史观派。本文所论新文化运动中的唯物史观派,就是从广义的唯物史观派来立论的。

二、唯物史观在中国思想世界崛起的根据

唯物史观在中国思想世界崛起之初,为什么就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能够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的思想旗帜,使这些新文化运动精英聚集在这面旗帜下而形成唯物史观派呢?究其原因,不仅在于唯物史观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获得了理论的彻底性和说服力,而且还在于唯物史

^①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174-175.

^②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175.

观在中国思想世界崛起本有其深刻的根据。

这里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20世纪第二个10年间世界和中国的社会历史所经历的大变局,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五四运动的爆发、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等一系列时代的大事件。正是这些时代的大事件,使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后的艰苦求索终于收获了重大的新成果,找到了唯物史观作为救国救民的真理,以此来观察中国的命运、解答中国的问题、探寻中国的出路、改变中国的面貌。

除了这些时代的大事件外,还有一些具体的现实因素对唯物史观在中国思想世界的崛起也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有三个因素尤其值得注意。

首先,唯物史观在中国思想世界崛起有其思想前提。不少研究者认为,正是19、20世纪之交兴起的以严复为代表的进化史观,取代了数千年来循环史观在中国思想世界的主潮位置,为中国人进一步接受唯物史观提供了思想前提,因为不论进化史观还是唯物史观都强调“进化”观念,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这种看法当然有其合理性,但又不免把这一哲学历史过程作了简单化的理解。因为到了新文化运动前期,以严复为代表的进化史观尽管依然盛行,但已出现了对它的怀疑与反思。严复鼓吹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作为进化史观的基本内核,在这时已受到相当多的批评。不仅一些曾深受严复影响的人转而吸取克鲁泡特金的“互助”思想,以缓和生存竞争带来的紧张与严酷,希望对进化史观作出更为适合人性的新理解,而且就是发起新文化运动、高扬进化史观的陈独秀,也看到了欧洲社会由中世纪向近代进化所带来的严重矛盾,承认:“近世文明之发生也,欧罗巴旧社会之制度,破坏无余,所存者私有财产制耳。此制虽传之自古,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①进化史观所遭遇的这一困境,为新的历史观念进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提供了思想契机。因此,唯物史观在中国思想世界崛起的思想前提,与其说是19、20世纪之交进化史观的盛行,不如说是新文化运动中对进化史观的反思。从进化史观到唯物史观的转进,两者间的内在逻辑其实就在这里。

其次,唯物史观在中国思想世界崛起有其现实基础。由于唯物史观不是抽象的历史哲学,因此它的开展需要现实基础;只有具备了这种基础,它才能转化为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1920—1921年间,环绕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思考和探讨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问题。毛泽东与远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好友蔡和森就对这一问题作过书信交流。蔡和森在1920年9月16日致毛泽东的信中,明确地提出了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唯物史观作为哲学基础。他说:“我以为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世界,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自柏拉图统御以来的哲学思想,(人生哲学,社会哲学)显然为有产阶级的思想。其特点重理想轻生活,重精神轻物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结果适与有产阶级的唯理派相反,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至堕入迷阵。”^②毛泽东在1921年1月21日回复蔡和森的信中,对蔡和森的来信赞扬备至,称“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对于蔡和森的唯物史观主张,他予以了积极响应,并更明确地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③这一论断实已超出了毛、蔡之间的思想探讨,代表了一代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初理解。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一开始就自觉地把唯物史观与中国共产党结合起来,使得唯物史观在中国兴起获得了坚实的现实基础。从进化史观到唯物史观的转进,固然有其思想开展的内在逻辑,但同时也离不开这种历史赋予的现实基础。在新文化运动中,一些追随孙中山的国民党思想家也对唯物史观做过传播,但由于他们缺乏这种基础,因而最后又都放弃了对唯物史观的主张。

再次,唯物史观在中国思想世界崛起有其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点。长期以来,文化保守主义者总

①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37-138.

②蔡和森.蔡林彬给毛泽东//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63.

③毛泽东.致蔡和森//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5.

是把唯物史观在中国思想世界的崛起指责为新文化运动“反传统”而导致的“西化”产物。其实，恰恰正是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对中国传统哲学资源的吸取与改铸，为接引唯物史观进入中国思想世界提供了结合点。这个结合点，就是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之初综合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和西方近世的政治哲学所形成的民彝史观。“民彝”一词出自《诗·大雅·烝民》的“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之语，曾长期为儒家所重视所阐发。李大钊对“民彝”作出了新的阐释，指出其含义在于：“言天生众民，有形下之器，必有形上之道。道即理也，斯民之生，即本此理以为性，趋于至善而止焉。”“视听之器，可以惑乱于一时，秉彝之明，自能烛照夫万物。”^①这样一来，他就在人民大众身上发现了一种合乎道理、努力向善的本性，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冲破蔽障、照明世界的作用。在他看来，“民彝”的这种本性和作用，也就是《尚书》所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决定了政治的趋向和政权的稳固，也决定了人类历史的走向。进入20世纪后，“民彝”的觉醒已成为世界潮流、历史趋势：“兹世文明先进之国民，莫不争取适宜之政治，以信其民彝，彰其民彝。吾民于此，其当鼓勇奋力，以趋从此时代之精神，而求此适宜之政治也，亦奚容疑。”^②正是基于民彝史观，他把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看作是“民彝”的觉醒，称之为“庶民的胜利”^③，认为这一革命体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流大趋势，由此而在新文化运动诸精英中最早理解和接受了唯物史观。李大钊从民彝史观走向唯物史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第一个结合点。

正是这些具体的现实因素与时代的大事件相结合，为唯物史观在中国思想世界崛起提供了深刻的根据，使之产生出巨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的思想旗帜，聚集起一批新文化运动精英而形成了唯物史观派。没有这些时代的大事件，没有这些具体的现实因素，没有这些深刻的根据，唯物史观是不可能在中国思想世界崛起并形成唯物史观派的；即使唯物史观在那时传入了中国思想世界，也只会像一些西方哲学思想一样只产生短时间的影响，而不会由唯物史观派发展出持续至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

三、唯物史观派对唯物史观的多维度阐释

唯物史观派作为一个学派和思潮，有其基本特征和共同性格，这就是赞成、信仰、传播唯物史观并使之中国化。大力阐释唯物史观，为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奠定哲学基础，使更多的中国人接受唯物史观而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他们所致力的重要工作。但是在对唯物史观的阐释上，他们又非依同一个模式、发同一个声音、讲同一个话语，而是呈现出个性化的色彩和多维度的特点。借用明清之际黄宗羲的说法，他们的这种阐释工作，不是那种“以水济水”的教条式重复，而是形成了“一本而万殊”的开放格局。

唯物史观派的这一理论特点，从形成的原因看，在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来自五湖四海，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知识结构、学术素养，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也有着不同的国际背景和思想来源。这使得他们对唯物史观的接受往往经历了不同的路径，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往往立足于不同的视域，对唯物史观的阐释也往往选取各自认为最适宜的维度。这些不同之点的存在，必然会导致对唯物史观理解和阐释的多样性乃至歧义性，甚至包含了很不一致的见解。如对唯物史观是不是一种哲学的问题，在唯物史观派内部就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④，陈独秀也赞成“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⑤，而李汉俊则力主“唯物史观不是哲学”^⑥。但正是通过这些不同之点，通过这些多样性乃至歧义性，又折射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自心路历程，汇聚了东西方不同国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和思想资源，反映了19、20世纪之交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和马克思主

①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李大钊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46.

②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李大钊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50.

③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李大钊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8.

④李大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03.

⑤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48.

⑥李汉俊.唯物史观不是什么?//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527.

义哲学民族化的双向运动,从而为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注入了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唯物史观派的这一理论特点,从形成的背景看,实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风貌的反映。倡导思想解放,弘扬主体意识,发挥生动活泼的创造精神,通过百家争鸣来促进思想发展,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风貌。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自主的而非奴隶的”^①奋斗目标,李大钊在《青春》中发出的“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②的急切呼喊,都典型地代表了这种精神风貌。当他们带领一批新青年转化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后,仍然在精神上保持和发扬了这一风貌。这也就使唯物史观派在理解和阐释唯物史观时有一种开放的心胸和自立的权衡,形成了个性化的色彩和多维度的特点。在这里,可以直接感触到洋溢着一种新思想新文化的青春气息,这种气息正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风貌所赋予的。

唯物史观派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固然以唯物史观为对象,却又超越了唯物史观的范围,扩大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域和思想空间。由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是革命家兼学问家,“中国向何处去”自然成为他们最为关注和亟须解答的时代大问题,这使得他们必然由历史观领域进入政治哲学领域,以唯物史观为指南探寻中国革命的道路,从而发展出最初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中,唯物史观派对玄学派和科学派都提出了批评,但在哲学本体论这一根本问题上,唯物史观派内部也存在着分歧:陈独秀、邓中夏明确否认本体论在现代哲学中的意义,瞿秋白则认为哲学的目的不仅在于说明社会历史运动,更在于探寻宇宙根底,力主用辩证唯物主义阐明本体论问题,由此开启了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样一来,唯物史观派从唯物史观出发,既拓展到更具体的政治哲学层面,又上升到更抽象的本体论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与意义作出了新的认识和理解。

在唯物史观派对唯物史观的多维度阐释中,有五位代表性人物的工作尤其值得注意:李大钊从历史学维度阐释唯物史观;陈独秀从政治哲学维度阐释唯物史观;蔡和森从人类学古史研究维度阐释唯物史观;李达以《现代社会学》建构唯物史观中国化表述体系;瞿秋白从唯物史观走向辩证唯物主义。他们的工作具体体现了唯物史观派的学术成就,集中代表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新文化运动的学术贡献。

四、李大钊:从历史学维度阐释唯物史观

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唯物史观在中国思想世界的崛起和唯物史观派的形成,首先是与他的名字、文章和思想直接相联系的。五四运动后不久,李大钊即与胡适展开了问题与主义论战,强调:“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③为了宣传“理想的主义”,在中国思想世界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他在《新青年》上接连发表了两篇阐发唯物史观的著名文章:一篇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与之相联系的阶级斗争理论、剩余价值学说进行介绍,使中国人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较系统的了解;另一篇是《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运用刚刚掌握的唯物史观考察中国现实,探讨新文化运动发生的社会历史根据,阐明了新思想新文化取代旧思想旧文化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这两篇文章标志着唯物史观作为一大思潮在中国思想世界的崛起。

李大钊进而结合他的历史学研究,对唯物史观进行了专门的介绍与阐释。这一工作集中体现在他于1920年撰写的讲义《史学思想史》^④和1924年出版的专著《史学要论》中。他的这些著述和思想,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投下了重要的影响。早在20世纪30年代,郭湛波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

①陈独秀.敬告青年//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30.

②李大钊.青春//李大钊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94.

③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

④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讲义,包括《史观》《今与古》《鲍丹的历史思想》《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历史思想》《韦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及其历史思想》《孔道西(Condorcet)的历史观》《桑西门(Saint-Simon)的历史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10篇文章。其中,韦柯今通译为维科,孔道西今通译为孔多塞,桑西门今通译为圣西门,理恺尔今通译为李凯尔特。

就对李大钊的这一学术特点及其思想贡献予以高度评价,称他是“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流的思想家”^①,指出:“李先生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潮这样澎湃,可说都是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②还有卢绍稷著《史学概要》一书,在论述现代中国史学之发达时,设有《现代中国论史学重要译著内容概略》一节,举出三部最具代表性的当代中国史学理论著作——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何炳松著《历史研究法》、李大钊著《史学要论》。书中对《史学要论》作了扼要介绍,称:“此本小册重要之主张是:‘吾信历史中有我们的人生,有我们的世界,有我们的自己,吾故以此小册为历史学作宣传,煽扬吾人对于历史学研究的兴趣,亦便是煽扬吾人向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寻找自己的兴趣’。”^③可见即使在白色恐怖的岁月中,李大钊的思想光辉和学术成就也未能被反动当局所掩埋。

李大钊从历史学维度阐释唯物史观,是从历史观入手的。他认为,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是与历史观的变革联系在一起。历史观作为对历史的一种解释,既是对历史的哲学思考,具有哲学的内容,又贯穿于历史学研究之中,是历史学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观也就是历史哲学。正是由于有了历史观,有了由此不断对历史所作的新解释,历史学才不是僵石、枯骨、故纸、陈编,而具有了生命活力和永恒魅力,成为了“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④。历史学由非科学演进为科学,正在于历史观的变革。

李大钊指出,在历史学成为科学之前的漫长岁月里,种种唯心史观曾主导着人们对历史的看法。他说:“古昔的历史观,大抵宗于神道,归于天命,而带有宗教的气味。当时的哲人,都以为人类的运命实为神所命定。国社的治乱兴衰,人生的吉祥祸福,一遵神定的法则而行,天命而外,无所谓历史的法则。即偶有重视王者、圣人、英雄、豪杰而崇之以为具有旋乾转坤的伟力神德者,亦皆认他们为聪睿天亶,崧生岳降,仰托神灵的庇佑以临治斯民。故凡伟人的历史观、圣贤的历史观、王者的历史观、英雄的历史观、道德的历史观、教化的历史观,均与神权的历史观、天命的历史观,有密接相依的关系。”^⑤只有至近代,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神学的衰微,历史学才逐渐现出曙光:维科、孔多塞、圣西门、孔德、马克思诸子,开始建立新的历史观,“努力以求历史法则之发现为己任而终能有成,跻后起的历史学、社会学于科学之列”^⑥。因此,他在历史学研究中特别强调历史观的古今变革、新旧更替。他说:“历史观本身亦有其历史,其历史亦有一定的倾向。大体言之,由神权的历史观进而为人生的历史观,由精神的历史观进而为物质的历史观,由个人的历史观进而为社会的历史观,由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进而为进步的历史观。……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可称为旧史观,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则可称为新史观。”^⑦在他看来,不了解历史观的古今变革、新旧更替,不了解历史观的历史及其倾向性,是不可能对历史有深刻了解的。

在新史观诸家中,李大钊最为推崇的是马克思。在他看来,历史学成为一种与自然科学同等地位的真正科学,是马克思以唯物史观探索历史运动根据的结果。他说,按照马克思的思想,“社会的变革,便是历史;推言之,把人类横着看就是社会,纵着看就是历史。喻之建筑,社会亦有基址(Basis)与上层(Überbau)。基址是经济的构造,即经济关系,马氏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的存在。上层是法制、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马氏称之为观念的形态或人类的意识。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氏历史观的大体”^⑧。正是由于马克思在经济关系中发现了人类历

① 郭湛波. 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 125.

② 郭湛波. 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 117.

③ 卢绍稷. 现代中国史学之发达 // 李孝迁. 中国现代史学评论.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16.

④ 李大钊. 史观 // 李大钊文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227.

⑤ 李大钊. 史观 // 李大钊文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227-228.

⑥ 李大钊. 史观 // 李大钊文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228.

⑦ 李大钊. 史观 // 李大钊文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229.

⑧ 李大钊.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 // 李大钊文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304.

史的最根本动因,而这种经济关系作为一种物质关系是能够进行经验性考察的,这就使得历史学具有了类似自然科学的实证性质。因此,“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①。对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李大钊表示赞赏和认同。他指出:“与吾人以一个整个的活泼泼的历史的观念,是吾人不能不感谢马克思的。”^②

李大钊又指出,唯物史观并非由马克思一人所独创,而是包括了马克思以前的诸多思想家的探索;也就是说,唯物史观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本身就是历史。重视对唯物史观史进行探讨和反思,是他从历史学维度阐释唯物史观的一大特点。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他已对唯物史观史进行了简要说明,指出:“马氏用他特有的理论,把从前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马氏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③在《史学思想史》中,他进而对唯物史观史诸环节作了系统反思,分别以专文衡论鲍丹、孟德斯鸠、维科、孔多塞、圣西门、马克思对唯物史观形成的思想贡献。在《史学要论》中,他又论述了从维科到马克思的历史观演进,说明正是通过这一思想进程,“已于历史发现一定的法则,遂把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历史学遂得在科学系统中占有相当的位置”^④。在这些探讨和反思中,李大钊留下了许多精彩而深刻的论述。

例如,对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历史学家鲍丹的名著《历史方法论》,李大钊作了深入论析。他特别看重鲍丹提出的历史分期理论,肯定了其中“确认历史是整个的一个进步的径路”^⑤的观念,指出:“他把历史的径路分为三大时期:第一是东南方民族占优势的时期,约经二千年之久,以基督的诞生终结;第二是中部民族即地中海一带的民族占优势的时期,为期亦约二千年,以条顿人的侵入终结;第三是北方民族推翻罗马而在文化上为导领的时期。三个时期,依于三方民族心理上的特性而各有其特色:第一的特色是宗教,长于知识与聪慧的艺能;第二期是实用的智慧,富有政治的能力与商业的活动;第三期是战争与产业或发明的技能。这个分法,实足以预见黑格儿(Hegel)的综合法。他那最有趣味的点,乃在人种的考察,地理与气候,亦算在内。这便是鲍氏的唯物史观。”^⑥李大钊进而提醒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鲍丹的新历史观,在史学上的贡献,如此其大,我们不能抹煞他的伟大的功绩,而于研索唯物史观起源时,尤不可遗忘了此人。”^⑦

又如,对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科的名著《新科学》,李大钊亦予以了很高评价。他说,《新科学》的特点在于:“由社会学的见地,论究国民的起源、发达、衰颓、灭亡的东西。国民便是此新科学的对象。他把国民的起源、发达、衰颓、灭亡,从人间历史的经验的事实归纳,以图于此树立人类性之道德的原理、政治的原理、权利的原理、法律的原理。这样子得的原理,实为历史的真要素。”^⑧他特别注意到维科与马克思的思想联系,指出:“他的研究方法,既为经验的归纳法,故其锐利的观察力,往往带唯物的倾向。此点与黑格尔全然相反,颇有马克思派的倾向,以唯物史观的原理或仅由物质的方面解释欲望说的原理为主。”^⑨他由此得出结论:“韦柯是社会学的先驱者,是历史哲学的建设者,是唯物史观的提倡者。”^⑩李大钊感叹地说,维科的思想出现在18世纪是一个时代错误,因而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它只有产生于19世纪,才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再如,18、19世纪之交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对唯物史观的贡献,在李大钊看来尤其值得重视,认为:“由空想的社会主义向科学的社会主义进化的程途而为开拓唯物史观的道路者,实为桑西

①李大钊.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05.

②李大钊. 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81.

③李大钊.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1.

④李大钊. 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08.

⑤李大钊. 鲍丹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52.

⑥李大钊. 鲍丹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50-251.

⑦李大钊. 鲍丹的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58.

⑧李大钊. 韦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及其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82.

⑨李大钊. 韦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及其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82.

⑩李大钊. 韦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及其历史思想//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82.

门。”^①李大钊特别谈到圣西门在亲历法国大革命后由知识的历史观转向经济的历史观,认为正是这种对经济因素的重视给予了马克思以深刻的影响。他说:“法兰西大革命时,几多政治的激变,使桑西门确信国家与社会间有本质上的不同。革命时的法兰西,约二十五年间,遭十度政治的激变。虽曾变革其政治的构造,而于社会生活的根底,未有何等可认的变化。桑西门躬逢这种事实,乃以看出政治形式的如何,实于人类生活无何等本质的意义,于社会不过是第二义的。构成社会生活的根底者,又从而附与其特质于各历史阶级者,不是知识,不是宗教,亦不是建筑于知识宗教之上的政治,实是那致人类物质生活于可能的产业组织。他于是确立一种历史的法则,认历史过程,惟有经由产业组织的变化,才能理解;将来的社会,亦惟依产业发达的倾向,才能测度;这就是他的经济的历史观。后来承此绪余而建立唯物史观的学说者,厥为马克思。”^②因此,在追溯唯物史观史时,圣西门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通过对唯物史观史的探讨和反思,李大钊揭示了唯物史观的思想来源与形成过程,强调了唯物史观是人类思想发展中的积极成果,说明了中国人接受唯物史观正是对这些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在这里,他对于唯物史观,不是仅看作是一种理论,而是更强调是一段历史。仅从理论上讲,这样讲出来的唯物史观是思辨的、枯燥的、难以吸引人的;而从历史上看,这样讲出来的唯物史观则是生动的、丰富的、富有吸引力的。李大钊作为接引唯物史观进入中国思想世界的第一人,能对这一新历史观作出如此独到理解和深刻阐释,其理论水准和思想境界都值得赞叹!

五、陈独秀:从政治哲学维度阐释唯物史观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向何处去”就成为中国哲学家思想家反复思考、不断探索的时代大问题;唯物史观派之所以赞成、信仰和传播唯物史观并使之中国化,就在于他们相信唯物史观是最终找到的救国救民真理,能够为解答这个时代大问题指明方向。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由历史观领域进入政治哲学领域,以唯物史观为根据发展出最初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的联系,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就已通过考察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予以了揭示,指出:“他的阶级竞争说,与他的唯物史观有密切关系”^③。李达1921年在《新青年》上发表《马克思还原》一文,亦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其重要原则有五: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马克思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均详备于此五原则之中。”^④因此,在唯物史观派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原本就关联一体,可以合而论之、相互发明。

在这方面,陈独秀无疑是唯物史观派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重视现实政治问题,特别是关注“中国向何处去”问题,是他学术思想中一以贯之的主轴线。这一学术主轴线实际上反映了他所经历的政治与学术之间复杂的人生道路。陈独秀自投身反清革命起,就一直与现实政治结缘。他发起新文化运动的真实动因,正在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五四运动的发生,把他重新呼唤回中国政治舞台,被投身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们视为“思想界的明星”^⑤。1919年与1920年之交,陈独秀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与李大钊共同发起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使他从这个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在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和早期活动中,他从唯物史观出发,以解答“中国向何处去”问题为中心,着重对上层建筑诸问题进行探讨。这决定了他对唯物史观的阐发是与政治哲学结合在一起的。

在陈独秀看来,解答“中国向何处去”问题之所以要从唯物史观出发,就在于唯物史观是一种“科学”。“科学”作为一种新价值观,本是在发起新文化运动之初就树起的一面旗帜,旨在以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打破中国人对旧思想旧文化的迷信。在转向马克思主义后,他又进一步扩大“科学”的内容,把

① 李大钊. 桑西门(Saint-Simon)的历史观//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92.

② 李大钊. 桑西门(Saint-Simon)的历史观//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96-297.

③ 李大钊.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9.

④ 李达. 马克思还原//李达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1.

⑤ 毛泽东. 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305.

实证社会科学、包括唯物史观纳入其中,形成了广义的“科学”观念。他指出:“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①从对“科学”的这种新理解出发,他把哲学分成了两类:一类为“实验主义的及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属于实证社会科学,当然是“科学”的内容;另一类为“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的哲学”^②,只是些胡想乱说,根本就不是“科学”的内容。这样一来,用唯物史观考察中国命运、解决中国问题也就具有了实证科学的可靠性和合理性。

从唯物史观出发,陈独秀为解答“中国向何处去”问题提出了新的政治理想,强调只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才指明了中国的出路,从而由新文化运动之初以近世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为楷模,转而以俄国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景。1920年,他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提出:“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③;在《国庆纪念底价值》一文中,他更明确地指出了这一新理想的内涵:“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④他进一步指出,之所以选择和认定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作为解决中国出路问题的指南,就在于这种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为根据的,是科学的而非空想的。他说:“马克思社会主义所以称为科学的不是空想的,正因为他能以唯物史观的见解,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成立所以发达所以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自然结果,是能够在客观上说明必然的因果,不是在主观上主张当然的理想,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别家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之要点。”^⑤又说:“我们对于改造社会,不可只看见我们自己主观上意志上改造的必要,必须由客观上观察社会的物质的条件有何种改造的可能,要处处不离开唯物的历史观,不可陷于唯心派的思想。”^⑥

陈独秀依据唯物史观,着重对如何在中国实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探讨。在探讨中,他虽然肯定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强调了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以生产力和经济生活的发展为前提,但并没有把自己理论的注意力和兴奋点放在这方面,而是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和早期活动,对上层建筑诸问题予以了特别的关注,从唯物史观出发对阶级、政权、国家、政党、革命等问题进行了阐发,由此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

陈独秀很重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运用唯物史观对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阐明。他说:“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著的《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书,这书底精髓,正是根据唯物史观来说明阶级争斗的。”^⑦他在这里所说的“阶级争斗”,即今天所说的“阶级斗争”。他认为,马克思在这方面主要有两个重要思想:一是“一切过去社会底历史都是阶级争斗底历史”;二是“阶级之成立和争斗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必然结果”^⑧。由此来看中国,要改变中国内忧外患的现状,就需要唤起劳动群众的阶级意识,使他们组成一个阶级,投入到反抗国内外压迫阶级、剥削阶级的斗争中。他在多篇写给中国劳动群众的文章中,对这个道理作了反复强调。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的开头,他明确提出了“无产的劳动阶级”概念,指出:“我现在所说的劳动界,是指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人而言。就职业上说,是把那没有财产的木匠、泥水匠、漆匠、铁工、车夫、水夫、成衣、理发匠、邮差、印刷排字工、佣工、听差、店铺的伙计、铁路上的茶房、小工、搬运夫,合成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⑨在《告劳动》一文的结尾,他特别向劳动群众强调阶级觉悟的重要性,指出:“免除困苦之唯一根本方法,只有各地各行的劳动都有了阶级

① 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23.

② 陈独秀. 《科学与人生观》序 //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48.

③ 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28.

④ 陈独秀. 国庆纪念底价值 //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80.

⑤ 陈独秀. 马克思学说 //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55.

⑥ 陈独秀. 关于社会主义问题 //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70.

⑦ 陈独秀. 马克思学说 //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56.

⑧ 陈独秀. 马克思学说 //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56.

⑨ 陈独秀. 告北京劳动界 //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9.

觉悟,大家联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去组织劳动阶级的国家政府国会省议会县议会,去解决劳动自身的困苦。”^①他的这些主张,对中国劳动群众进行了阶级意识的启蒙,对中国共产党确定自己的阶级基础和依靠力量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与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相联系,陈独秀运用唯物史观对政权问题进行了阐发。他首先从一般意义上分析了政治的强权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作用,指出政治的强权尽管带有“恶”的性质,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它在人类历史进化中的积极作用。他说,水火、炸药和雷电这些自然力都可以杀人,但如果加以合理利用,却能造福于人类;同样,“人类底强权也算是一种自然力,利用他也可以有一种排除黑暗障碍底效用”^②。他进而认为,在争取人类进步的阶级斗争中,政权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手段,对相互斗争阶级的胜负盛衰起着关键的作用:“从前有产阶级和封建制度争斗时,是掌了政权才真实打倒了封建,才完成了争斗之目的;现在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争斗,也必然要掌握政权利用政权来达到他们争斗之完全目的,这是很明白易解的事。”^③针对第二国际对苏俄无产阶级专政的指责,他作了针锋相对的反驳:“他们忘记了马格斯(即马克思——引者注)曾说过: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那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④对于中国的政治现状,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我们希望中国人民能够快快起来夺得政权,而且能够组织一个真能代表人民的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将侮辱中华民族,压迫中国民众,掠夺中国富源等事实,一概消灭。”^⑤他的这些思想,从理论上廓清了中国共产党进行阶级斗争的政治目标,使党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政权问题,为在中国建立人民政权而奋斗。

陈独秀又对与政权问题相联系的国家问题进行了阐明。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从主观愿望出发,主张取消一切国家,不仅反对资产阶级国家,而且否定无产阶级国家。陈独秀坚决反对这种唯心主义国家观,力主从唯物史观出发看待国家的存在与消亡。他指出,国家与阶级、政权结合在一起,代表了一定阶级的利益与意志,是人类历史发展至一定阶段的产物,既不能随人的主观意愿而取消,也不会永远地在历史上存在。他说:“本来国家这个制度,克鲁巴特金(即克鲁泡特金——引者注)并没有主张即时就可以废去,马克思也没有主张永远不能废去,这道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说得极明白透彻。”^⑥他进而指出,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来说,也不能立即取消国家;相反,无产阶级只有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有效地维系已经掌握的政权,保障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新型民主制度。无产阶级国家也包含使用政治的强力,这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是必不可少的。他以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国家为例进行了说明:“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巴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免。”^⑦正是这样,他明确地提出在中国建立“劳动阶级的国家”的主张,强调:“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⑧

陈独秀指出,在现代政治活动中,政党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对阶级斗争、政权更迭、国家兴衰都有着重大影响。但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有产阶级政党早已腐败不堪,从而导致了现实政治的混乱不宁。他说:“有产阶级各政党底过去的成绩,造谣、倾陷、贿卖、假公肥私、争权夺利、颠倒是非、排斥异己,不分东方西方都在百步五十步之间。以这班狐群狗党担负政治的责任,政治岂有不腐败之理。”^⑨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如不彻底改造,中国的政治决没有改造的希望;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人民看到了

① 陈独秀. 告劳动 // 陈独秀著作选: 第 2 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286.

② 陈独秀. 谈政治 // 陈独秀著作选: 第 2 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157.

③ 陈独秀. 马克思学说 // 陈独秀著作选: 第 2 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359.

④ 陈独秀. 谈政治 // 陈独秀著作选: 第 2 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163.

⑤ 陈独秀. 丧尽利权的鲁案协定 // 陈独秀著作选: 第 2 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401.

⑥ 陈独秀. 答黄凌霜(无产阶级专政) // 陈独秀著作选: 第 2 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371.

⑦ 陈独秀. 谈政治 // 陈独秀著作选: 第 2 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159.

⑧ 陈独秀. 谈政治 // 陈独秀著作选: 第 2 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164.

⑨ 陈独秀. 随感录·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 // 陈独秀著作选: 第 2 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289.

新的希望。然而,中国共产党能否不负中国人民的希望呢?作为党的主要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指出:“我以为共产党底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在理论上,自然要好过基础建筑在有产阶级上面用金力造成的政党;但是天下事‘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旧政党底腐败诚然是信而有征,新的共产党究竟如何,全靠自己做出证据来才能够使人相信啊!”^①而党取信于民的关键,他强调在于共产党人必须保持自己的信念和理想,指出:“共产党党员自身若有利用劳动运动而做官而发财的行为,或当劳动运动危急时畏缩不前,共产党便应该立刻驱逐这种的败类的党员出党而毫不顾恤。必如此才算是真的共产党,不然便是假共产党。”^②他的这些话,尽管是针对初创之时的中国共产党说的,但这一建党之“初心”,在9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当忘却的。

在如何改造中国的问题上,陈独秀强调了革命道路,不赞成改良方式。他指出,改造中国之所以必须走革命道路,这是由中国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他说:“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的及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Evolution呢?”^③陈独秀又指出,由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既不同于欧美、又有别于苏俄,因此中国革命必须走一条自己的道路。1923年,他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的开篇,即提出了这一问题:“人类经济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二种:一是宗法封建社会崩坏时,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一是资产阶级崩坏时,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此外又有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④这就是说,对现时代的中国革命来说,只能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首先从国民革命入手。他说:“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处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两层严酷的压迫之下,而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是目前的需要,而且可能。”^⑤尽管他的这些思考只是初步的,还有许多重要问题没有解决,但毕竟在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革命道路时,就指出了这条道路的特殊性并产生了重要影响。党的三大宣言就明确提出:“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⑥接下来的1925—1927年大革命,就是国共两党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共同发起和进行的。

陈独秀的这些探讨和阐发在学理上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形成了最初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另一方面又丰富和深化了中国人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他的这些思想不仅对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中国共产党最初的政策和策略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之后即积极而有效地开展了自己的最初政治活动,并在短短几年中就发展成为中国的重要政治力量,是与这位主要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的政治哲学思想分不开的。

六、蔡和森:从人类学古史研究维度阐释唯物史观

在唯物史观派中,蔡和森的重要思想贡献,不仅在于他在留法期间就与毛泽东通过书信往来,提出了以唯物史观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而且更在于他归国后撰写了《社会进化史》一书,从人类学古史研究维度对唯物史观进行阐释。1923—1924年,蔡和森在瞿秋白主持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讲授“社会进化史”课程,在讲稿的基础上形成了这部专著,由上海民智书局1924年出版。全书由绪论和正文三篇组成,绪论追溯了人类由史前史向文明史的演进程序,正文三篇分别探讨了家庭、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与进化,这些内容构成了一个从人类学古史研究维度阐释唯物史观的体系。

蔡和森对这一维度的选择,是同他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分不开的。1921年2月,他从法国致信陈独

①陈独秀. 随感录·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89.

②陈独秀. 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采取的态度//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67.

③陈独秀.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复东荪先生底信//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211.

④陈独秀.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57.

⑤陈独秀.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566-567.

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76.

秀,开头即宣称自己的思想立场:“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①他接着谈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②,指出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一是在历史上发明唯物史观,二是在经济上发明资本论;三是在政治上发明阶级斗争说。这三者一以贯之,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在他看来,通过历史研究说明唯物史观,揭示人类社会进化规律,是从学理上阐发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的《社会进化史》即是基于这一认识而撰写的。

蔡和森对这一维度的选择,又与他留法期间所受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影响相联系。对于19世纪人类学研究的成果,特别是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马克思在晚年曾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留下了著名的《人类学笔记》,并计划从唯物史观立场出发撰写一部关于人类史早期阶段的专著。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遗愿,并利用马克思对《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摘要和批语,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名著,开辟了通过人类学古史研究阐发唯物史观的道路。拉法格作为马克思的爱婿和法国马克思主义派领袖,直接承继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一思路和研究成果,撰写了《财产及其起源》一书,依据人类学古史研究,对私有制起源作了更深入的探讨,对唯物史观作了更具体的阐发。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传统,对蔡和森投下了重要的思想影响,直接启发了他写作《社会进化史》。《社会进化史》的主体内容,就是吸取恩格斯和拉法格这两书思想而来。

在《社会进化史》中,蔡和森首先阐明了从人类学古史研究维度阐释唯物史观的重要意义。他十分重视恩格斯对摩尔根人类学古史研究的评价,充分肯定了摩尔根研究工作的哲学意义,认为:“摩尔根真是发明原始人类演进程序的第一人;他身居美洲土人印第安民族中,前后考察凡数十年;他从‘群’‘家族’以至‘国家’的形成,挨次追溯社会的进化。他不知道马克思,也不知道唯物史观的学说;然而他于不知不觉中,竟在美洲从新发明并且系统的应用了这种真理(马克思是在他的前四十年发明的),他所研得的主要结果,大致与马克思是一样的。”^③由此而进,他又高度评价了恩格斯吸取摩尔根和马克思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所作的重要思想贡献,指出:“恩格斯著《家族私产与国家之起源》(即《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引者注),将摩尔根和马克思两人的意见联合一致,至此摩氏不朽之业才发扬光大于世,而历史学亦因此完全建立真实的科学基础。”^④在他看来,从人类学古史研究维度阐释唯物史观,正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致力开辟的,因此是不可忽视、不可或缺的。

蔡和森进而指出,要了解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独特贡献,首先要了解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即在考察人类历史发展时,不仅要看到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还要看到人类自身的生产所起的重要作用。在《社会进化史》第一篇的开头,蔡和森即指出:“人类进化的主要动因有二:一是生产,一是生殖。前者为一切生活手段的生产,如衣食住等目的物及一切必要的工具皆是;后者为人类自身的生产,简言之即为传种。人们生活于一定时期与一定地域的各种社会组织,莫不为这两种生产所规定所限制。这两种生产在历史上的演进:一面为劳动发达的程序;别面为家族发达的程序。”^⑤这就是说,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对人类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予以了更全面更深刻的阐发,从而发展和丰富了唯物史观。正是由此出发,恩格斯依据人类学古史研究成果,把家庭的演变、财产的起源、国家的形成与消亡、父权制文化的确立及其批判诸问题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阐释。《社会进化史》的主体内容,就是系统论述这种对唯物史观的新阐释。

蔡和森指出,家庭作为人类自身的生产单位,在人类历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人类历史上,家庭制度经过了血统家族、伙伴家族、对偶家族、一夫一妻家族的依次演变;人类社会亦与之相联系而不断进化,由野蛮时代经过半开化时代而逐渐走向文明时代。对于血统家族的存在原因及对人类历史的影响,

①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74.

②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74.

③蔡和森.社会进化史//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37-438.

④蔡和森.社会进化史//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38.

⑤蔡和森.社会进化史//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44.

他进行了分析：“人类进步的大时代，是直接和食品来源的扩充相适应的。而家族的团结，便是直接适应这种需要。由自然的逼迫，范围人们于这种经济生活的集团后，低弱程度的共同劳动与共产生活遂横贯有史以前的时代之全部。”^①对对偶家族的出现和向一夫一妻家族的演进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他予以了揭示：“对偶家族的出现，恰好划分野蛮时代和半开化时代的界限。……一夫一妻的家族，是从对偶家族发达达到文明时代的新界线产生的。”^②他进而指出，家庭的进化之所以成为人类进化的标尺，就在于家庭的进化归根到底反映了生产方式的变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生产方式，因而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婚姻制度，群体婚姻成为野蛮时代的特征，对偶婚姻成为半开化时代的特征，而一夫一妻婚姻则成为文明时代的特征。

与考察家庭的演变相联系，蔡和森进而考察了财产的起源与进化。在这方面，他更多地吸取了拉法格在《财产及其起源》中所阐发的思想。一方面，他重视拉法格对个人财产起源及其进化诸环节所进行的历史考察，吸取了拉法格关于从原始共产主义、血族集产制、封建财产到资产阶级财产历史演变的论述，构成了《社会进化史》第二篇的主要内容。其中，拉法格关于村落集产制的探讨，引起了他的很大关注。他说：“自摩尔根发明氏族共产制的真相后，吾人才知村落集产制还属原始氏族共产社会所派生的形态。所以拉法格在他著的《财产历史》（即《财产及其起源》——引者注）上面便给这种财产形式以血族集产制的名称，以与他所从出的原始共产制相区别。”^③另一方面，他重视拉法格对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财产发展现状的思考，并结合中国实际对资产阶级财产的新发展予以了着重说明，指出：“资本主义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连续不停的改革生产和交通的方法，于是完全破坏了地方的、城市的和国家的经济单位，而代之以国际的经济单位。由世界市场之不停的开拓，遂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发达至于极点。资本主义在百余年中所创造之各种伟大的生产力，比以前一切时代（自原始共产时代以至封建时代）的生产力之总和不知超越若干倍。机器的发明，各种自然力的征服，化学工业的应用，大农业的发达，轮船火车的便利，各大陆的开辟，桥梁水道的建筑……好像魔术师使用魔术，把人们陡然换了另外一个天地，不但可使冬季变热、夏季变冷、各大陆之距离缩短至于至低限度，而且可使中国农人因外国商品的输入而破产，上海金融要视伦敦纽约的行情为涨跌。”^④在这里，他对现时代的生产力、世界市场、国际金融和中国社会的关系进行了说明，不仅指出资本主义创造了新的生产力，而且强调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市场；不仅指出世界市场的形成在于生产力的发达，而且强调国际金融在世界市场中的关键作用；不仅指出世界市场和国际金融造成了全球性现代化运动，而且强调中国也不可能避免卷入其中。

在对家庭的演变、财产的起源进行考察后，蔡和森着重对国家问题作了探讨。在《社会进化史》中，论析国家问题的篇幅最大，着重对国家的产生、本质、消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说明。他认为，国家不是社会以外的强制权力，也不是黑格尔所说的“道德理想的实践”或“理性的实现与想象”，而是社会进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当社会分裂为几个不可调和的阶级抵抗与经济上发生利害冲突的时候，社会自身不能克制或医治这些冲突与抵抗；然而这些冲突与抵抗决不能自作自息；社会无穷的罹受这些无益的争斗，便自然而然要求一种显然统治社会的势力来平息各种冲突而纲维一切于‘秩序’的界限之内。这种势力是由社会产生的，但是建立在社会上面，并且渐渐与社会隔离。这种势力是什么呢？就是国家。”^⑤他从历史上阶级的出现及阶级间的关系出发，对国家的本质进行了分析，指出：“国家是由于控制阶级斗争的需要产生的；但他的内部又产生一些阶级斗争。照普遍的定律说，国家乃是在经济地位上极占优势的阶级的机械，这个阶级借着国家的设立又成为政治上的支配阶级，并且由此又造成一些掠夺被压迫阶级的新工具。”^⑥他还论及了国家的消亡问题，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及其所抱的理

①蔡和森. 社会进化史//蔡和森文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450.

②蔡和森. 社会进化史//蔡和森文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464.

③蔡和森. 社会进化史//蔡和森文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503.

④蔡和森. 社会进化史//蔡和森文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534.

⑤蔡和森. 社会进化史//蔡和森文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613.

⑥蔡和森. 社会进化史//蔡和森文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614.

想,指出:“国家不是永远存在的。在他所从出的远古的氏族社会里面并没有国家和政权的意义。经济发达的程度到了自然惹起社会阶级分裂的时候,才由这种分裂形成国家的必要。现在生产发达的程度已使我们大踏步的接近了这样的时代,即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必要,而且成为生产上的大障碍。阶级必致于消灭,也和其必致于发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也必致于消灭。到那时候,社会将从新组织于生产者自由平等的和有组织的生产基础上,而将全副国家机关移置于上古的博物院,使之与手纺车青铜斧并排陈列。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可做到,要待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才能做到。”^①他从人类学古史研究维度对国家问题的探讨,与陈独秀从政治哲学维度对国家问题的探讨,恰形成了相互的补充,共同推进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问题的认识。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蔡和森十分重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父权制文化的批判。在《社会进化史》中,他反复重申了恩格斯的有关思想,用以说明一夫一妻制的出现与实质、进步性与局限性。他说:“母权的推翻,是女性在历史上一个大失败。男子既在家庭中取得统治权,妇女即成为单纯的生育机械与供男子使用之奴隶。”^②又说:“一夫一妻制,在历史里面,绝不见得为男女两性之调和;反而男性隶属女性,发生前此未有的两性冲突。男女间育儿的分工,为人类第一种分工;而一夫一妻制里面男女两性间的抵抗,也是随着历史而俱发达的第一种阶级抵抗。一夫一妻制固然是历史上一个大进步,但同时她在奴隶制与私有财产制之旁,开始了一个维持到我们今日的时代——即文明时代;在这个大时代中,每一个进步同时必有一个相当的退步为伴侣,而一部分或一阶级的幸福,即以别部分或别阶级的痛苦和压迫为代价。”^③同时,他又清醒地认识到,克服一夫一妻制的局限性,实现女性的真正解放,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必须以工业大生产的发展为前提。他十分重视恩格斯的这一观点,认为:“家族历史发达达到近世大工业时代,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既不是经济的单位,复不是政治的要素。极少数资产阶级的家庭,赤条条的是金钱联缀起来的性交和娱乐的一种场所(但此外还有多种);最大多数无产阶级的家庭则早已为大工业所破坏,他们的妻女及小孩都须离开家庭而与男性劳动者同过大工厂的生活。换过说,即两性间家庭劳动与社会生产劳动的分工已为大工业所冲破,而贬谪数千年的妇女至此才渐有恢复原始时代的重要地位而趋于解放之可能。”^④

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未能开展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古史研究;在《社会进化史》中,蔡和森力图改变这一状况,依据唯物史观对中国的历史实际作出初步说明。例如,他在论述家庭进化问题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探讨了宗法家族问题。他指出,所谓宗法家族是由对偶家族到一夫一妻家族的过渡形式,全部家庭组织在家长式的父权统治之下。宗法家族在世界上各开化民族中都存在过,但在中国有着十分典型的表现:“中国宗法的大家庭,亦常以‘九世同居’或‘五代同堂’为美谈。几代同居的老房屋,在各处还存留不少。这种宗法的大家庭,简直统治中国有史以来的家族生活,不过至最近几十年,受着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影响,农业经济和家庭经济根本崩溃,这类大家庭才迅速的崩溃起来。不然,虽世代代有敢于变法之商鞅,也不能完全剿灭这类大家庭的存在,因为她完全是建筑在农业的经济基础上面。”^⑤又如,他指出中国宗法家族框架内的一夫一妻制,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而是以一夫多妻习俗作为补充形式;一夫多妻习俗的流行正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的贫富分化与阶级对立。他说:“例如中国,畜妾与多妻,不过是富人的特权,‘小老婆’大都是由金钱购买来的;至于一般民众,大概总是过一夫一妻的生活。广东地方的风俗,凡稍为富裕之人,即须畜妾三四,以点缀门面;若在稠人广众之中,问及某富人只有一妻,则被问者及坐众,无形中皆觉不甚‘体面’。这尤足以证明多妻为富人之奢侈品。”^⑥再如,他在论述财产进化问题时,依据拉法格有关村落集产制的论述,专设《村落

①蔡和森. 社会进化史//蔡和森文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616.

②蔡和森. 社会进化史//蔡和森文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71.

③蔡和森. 社会进化史//蔡和森文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84-485.

④蔡和森. 社会进化史//蔡和森文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85.

⑤蔡和森. 社会进化史//蔡和森文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72.

⑥蔡和森. 社会进化史//蔡和森文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73-474.

社会在中国之遗迹》一章,对中国宗法社会中的村落集产制问题进行探讨。他指出:“村落集产社会不仅为母权到父权,半开化到文明的过渡,而且横亘在各开化民族中的宗法社会也是由她产出的。因而她的遗迹在最老的宗法社会或封建社会里面,每每可以为长期的残存。不仅在俄罗斯如此,在中国也还有其遗迹。”在他看来,“原始母权氏族的共产社会,在中国久已淹没无痕迹了,独村落集产社会的痕迹还多少可耐寻索:不仅‘张家村’‘李家村’等现在还遍存于各地,而所谓三代以上的‘井田制’及以后模仿或梦想井田制而发生的‘授田’‘均田’‘班田’‘限田’等制度与学说莫不为远古集产制度之遗影。”^①他的这些有关中国历史实际的说明,虽然在书中所占篇幅不大,在今天看来还很肤浅,但毕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探讨中国历史实际、开展中国古史研究的开端。

通过人类学古史研究维度阐释唯物史观,承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开辟的这一工作,蔡和森是第一个有此自觉并付诸探索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之前,虽已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注意到这一维度,如沈雁冰(茅盾)1921年在《家庭改制的研究》一文中,即称赞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不论在理想方面、在事实方面多是极不错的”,表示“尤佩服他们考史的精深”^②,但直到《社会进化史》问世,才使中国人在这方面有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成果。继蔡和森之后,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沿着这一方向深入中国古史研究领域,有郭沫若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商时代的中国社会》相继问世,从而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历程。由此可见,在唯物史观派中,蔡和森作出了特殊的学术贡献,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七、李达:《现代社会学》建构唯物史观中国化表述体系

在唯物史观派中,李达是与李大钊、陈独秀齐名的代表人物。郭湛波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就有这样的评价:“中国研究马克思学说最有心得、介绍最早的就数陈独秀、李大钊、李达。”^③早在日本留学时,李达就翻译了郭泰著《唯物史观解说》,由中华书局1921年出版,成为现代中国第一部专论唯物史观的译著。李汉俊在《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一文中,对“现在关于马克思学说的书”作了分类介绍,其中唯物史观类的第一部书就是《唯物史观解说》,并注明:“郭泰著、李达译、中华书局发行”^④,由此可见这部译著在当时的影响。1922年,李达受毛泽东邀请回湖南主持湖南自修大学,并先后在湖南多所大专学校讲授唯物史观,在讲课的基础上撰写成《现代社会学》一书,由现代丛书社1926年出版,又由昆仑书店1928年出版修订本。这部书出版时虽然已是大革命时期,但书中对唯物史观的阐发实是直承新文化运动中的唯物史观派而来,因而仍可视为唯物史观派的重要学术成果。2007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将《现代社会学》1928年修订本纳入《武汉大学百年名典》丛书重新出版。

《现代社会学》所论“社会学”,也就是唯物史观。1949年前,由于政治环境的压迫,李达往往在“社会学”的名义下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的专著《现代社会学》《社会之基础知识》《社会学大纲》都是如此。因此,他所讲的“社会学”实有其特殊的含义,不可作通常意义上的社会学来看待。诚如他在《现代社会学》中所说:“本书为完成社会学真正之使命,……而主张历史的唯物论。”^⑤在书中,他综合了唯物史观派从不同维度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阐释,对唯物史观作了全面、系统、准确、深入的阐发,从说明社会学性质入手,进而揭示了社会的本质、结构、起源与发展,考察了家庭、氏族、国家的起源与演变,阐发了社会意识、社会变革、社会进化、社会阶级、社会问题、社会思想、社会运动诸问题,最后落脚于对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论析,并由此展望人类社会的将来。书中的这些内容,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论说确切、分析细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唯物史观中国化表述体系。

①蔡和森. 社会进化史//蔡和森文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510.

②沈雁冰. 家庭改制的研究//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255.

③郭湛波. 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278.

④李汉俊. 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上册.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569.

⑤李达. 现代社会学.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6.

李大钊从历史学维度对唯物史观的阐释,为《现代社会学》吸取和发挥。书中第一章《社会学之性质》在论及“社会学与诸科学之关系”时,首先说明的就是作为“社会学”的唯物史观与历史学的联系,指出:“社会学欲探求社会进化之原理,必须借助历史学所提供之资料;历史学欲解释历史事实之因果关系,必须应用社会学所提供之方法。”^①正是这样,书中对唯物史观基本问题的阐发,不是着眼于下定义,而是着重于历史考察。尤其是第四章《社会之起源》、第五章《社会之发达》、第十章《社会之变革》、第十一章《社会之进化》,都是从历史考察来说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其矛盾运动。对此,李达在书中有过说明:“普通社会学书,有所谓社会静学及社会动学之分。社会静学通论社会之静态,如社会之构造是;社会动学通论社会之动态,如社会之发达与变迁等是。然所谓静态,仅属一种假定,藉便研究而已,其实自社会之起源以至于最后之变迁,皆属于动态,无须为动静之分也。”^②这就是说,只有从历史的动态中、从社会的变迁中,才能对唯物史观作出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蔡和森从人类学古史研究维度对唯物史观的阐释,也为《现代社会学》重视和吸取。书中第一章《社会学之性质》在论及“社会学与诸科学之关系”时,强调了作为“社会学”的唯物史观与人类学的联系,认为:“人类学分数部,如人种学研究原人社会生活之状态,如考古学研究原人之遗物,如文化史研究原始社会文化之由来,皆与社会学有密切之关系。社会学推求社会之起源,考察原始社会之制度,不能不取材于人类学。”^③具体到书中,第六章《家族》、第七章《氏族》、第八章《国家》,都是从人类学古史研究出发阐释唯物史观,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成为了全书的重要内容。李达对此作了说明:“家族、氏族及国家,皆为社会发达程序中之产物。家族为社会生活之摇篮,家族制度之变迁,即社会生活变迁之佐证。氏族为初期社会之共同团体,有维持社会秩序之机能;国家成立于氏族组织废墟之上,为阶级统治之组织。就氏族与国家研究其发展与变迁之因果关系,足为推求社会进化原理之资助。”^④

重视上层建筑的作用并从政治哲学维度阐释唯物史观,是《现代社会学》的鲜明特色。这方面的内容在书中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如第八章《国家》、第九章《社会意识》、第十二章《社会阶级》、第十三章《社会问题》、第十四章《社会思想》、第十五章《社会运动》、第十六章《帝国主义》、第十七章《世界革命》。其所以如此,从思想上看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李达积极参与了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陈独秀从政治哲学维度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李达自己最初的哲学活动,亦是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着重从政治哲学维度传播和阐释唯物史观。1920—1921年的社会主义问题论战,主要就是在陈独秀、李达与梁启超、张东荪之间展开的。1923年,李达发表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更是这方面的名篇。因此,在《现代社会学》中,重视上层建筑的作用并从政治哲学维度阐发唯物史观自然成为一大重点。

《现代社会学》所建构的唯物史观中国化表述体系,不仅综合了唯物史观派从不同维度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阐释,而且更新了李达自己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阐释,用今天的话说是“综合创新”的成果,其创新点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既坚持唯物史观的唯物论,又注重唯物史观的辩证法。在书中,李达强调“人类之生存及活动,以一定物质之存在为前提,为条件”^⑤,强调生产力和经济生活对人类社会的最终决定作用,把这一点作为唯物史观的基本点,主力“应用历史的唯物论说明社会之本质”^⑥。但同时,他又十分重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认为在大工业及世界市场日益发展的现代社会更是如此。他论析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认为:“生产力置之资本社会之生产关系中则受阻碍而不克发展,遂化为食人之恶魔;若置之合理之生产关系中,则遂其畅发之性,即成为顺从人类之忠仆。然则改变生产关系以发展生产

①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9.

②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0-11.

③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0.

④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1.

⑤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8.

⑥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6.

力,实社会进化所必经之程序,亦即现代社会革命之所由来也。”^①他更看重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指出:“上层建筑,由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而造成,……然上层建筑又能影响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此不可不知也。”^②在他看来,理解和阐释唯物史观应当把唯物史观的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的辩证法结合起来,不能只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对唯物史观的内涵作了深入阐发,纠正了当时不少人把唯物史观等同于经济史观的误解,而且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启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地关注和合理地发挥上层建筑的作用。

其次,既坚持唯物史观的历史感,又注重唯物史观的现实性。在书中,李达吸取和发挥了李大钊、蔡和森阐释唯物史观的思路,对唯物史观基本问题的阐发赋予了强烈的历史感。如对国家问题,他就不是仅用抽象的定义来说明,而是通过具体的历史来阐释。他考察了历史上逐渐展开的不同国家形式,分别探讨了初期封建国家、高级封建国家、近代代议国家,对其实质逐一进行剖析和衡论,并由此得出结论:“国家恒随经济的发展而异其存在之形式,无论其变化如何,而其为阶级的国家则一也。经济生活之进化,产生阶级之对立,国家即为抑制此阶级对立而生,故国家恒成为支配阶级剥削被支配阶级之具,所不同者,阶级之组成与剥削之方法耳。初期封建国家为奴隶所有者支配奴隶之国家,高级封建国家为封建诸侯支配隶从者及农民之机关,近代代议国家为资本家压制劳动者之工具。”^③但李达对历史感的重视,并不是要把唯物史观变成一种历史知识,而总是落脚于现时代的中国,使唯物史观显示出强烈的现实性。在国家问题上,他就没有止步于对上述三种国家形式的历史考察,而是进一步指向现实,揭示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用社会主义国家取代近代代议国家的政治目标,指出:“资本主义发达至于最后时期,则一切大规模之生产手段次第社会化。无产阶级终至于代替资本阶级,掌握国家权力,将一切生产手段收归国有。此时之国家为大多数无产阶级之国家,为促成真正全民政治之国家,为社会主义国家,与历史上之国家性质大异,要不外于统治形式中实现社会主义,而剥削的支配则已归于消灭矣。”^④正是这种历史感与现实性的有机结合,使该书对唯物史观作出了深刻阐发,不仅能够说明以往的历史,而且能够回应当下的时代。

再次,既坚持唯物史观的学术性,又注重唯物史观的革命性。与注重唯物史观的现实性相联系,李达不赞成把唯物史观仅作为书斋里的学问,而强调唯物史观是中国革命的指南。因此,书中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阐释,既重视从学理上立论和探讨,又于学理中凸显了鲜明的革命性,最后归结为对正在进行中的中国国民革命的思考,指出现代中国的出路。他指出,中国社会问题严格地说是出现于近代海通以后,与西方社会问题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又有自己的特殊性,从而导致中国社会问题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如在中国劳动者问题上,就存在着与西方劳动者问题不相同的三个特性:一是中国产业劳动者,因没有国家立法保护,所受的剥削压迫远比西方劳动者严重;二是中国手工业者,因产业革命大量失业,再寻职业十分困难,往往流为盗匪,不像西方失业者能够通过出售劳动力于资本家取得再就业;三是中国农业劳动者,由于传统农村经济受资本主义影响而破产,生存状况极为艰难,以致穷年劳动不能赡养身家,壮者散之四方,弱者转死沟壑,这也是其他国家农村劳动问题所没有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更加重了对中国的侵略:“经济的侵略,即在于利用金融资本支配中国,使成为彼等之商品市场、原料产地与投资处所;政治的侵略,即在于利用武力或政治的优越势力控制中国以予取予求。经济的侵略,目的也;政治的侵略,手段也。”^⑤正是这样,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以来内忧外患的总根源,成为中华民族最凶恶的敌人和中国国民革命最主要的对象。他的结论是:“帝国主义之为祸于中国,至今日而极矣。金钱奴我以物质,宗教奴我以文明,教育奴我以服从,勾结我国贼,制造我内乱,涂炭我人民,迹其用意,直欲永远陷中国于分崩离析万劫不复之境,以继续其掠夺宰

① 李达. 现代社会学.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82.

② 李达. 现代社会学.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21.

③ 李达. 现代社会学.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66.

④ 李达. 现代社会学.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67.

⑤ 李达. 现代社会学.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175.

割之政策而已。帝国主义不死，大盗不止，中国年来之国民革命运动，其殆为帝国主义侵略之反响也欤！”^①他进而指出，帝国主义时代弱小民族的国民革命，都存在着一个领导权问题：“领导民族革命运动者，果为资产阶级乎？抑为无产阶级乎？”^②他的答案是：“工农无产分子虽与资产阶级同感受帝国主义及其使者——封建阶级及帝国主义者之代表——之压迫，而后者较前者尤感利害切肤之痛，其革命精神亦特别激昂。弱小民族无产阶级所以能成为民族革命之中坚者以此。爱尔兰独立运动之中心，已由自由党而移于共产党；印度独立运动之中心，已由非妥协之甘地派而移于无产阶级；朝鲜独立运动之中心，已由民主派之独立党而移于共产党；即其明证也。”^③由于当时环境的限制，李达在这里未能直接谈到当时的中国，但实际上已指出了中国国民革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把唯物史观与中国革命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探讨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与前途问题，正是该书的现实性和革命性最集中的体现。

上述这些创新点表明，《现代社会学》所建构的唯物史观中国化表述体系，提供了理解唯物史观的广阔视野，阐发了唯物史观的丰富内涵，赋予了唯物史观以中国特色的性格，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第一个10年的理论总结。这一体系的建构，不仅在学理上昭显了唯物史观所具有的学术价值，而且在现实中使唯物史观便于为更多的中国人所了解和掌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八、瞿秋白：从唯物史观走向辩证唯物主义

瞿秋白既是狭义的唯物史观派的主要成员，又是广义的唯物史观派的重要成员。1923年，从苏联归国不久的瞿秋白，即以革命家兼学问家的双重身份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和思想舞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作出了多方面贡献。他参与了科学与玄学论战，指出科学派与玄学派由于缺乏正确哲学思想的指导，“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争辩实在打不着痛处”^④。他撰写了一批政治哲学论文，对土地、人民、主权、政权诸问题进行探讨和阐发，特别研究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问题，阐明了无产阶级参与并领导国民革命的必要性与其合理性，提出了“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社会革命合流直达社会主义”^⑤的见解。他受党的委派出任国共两党联合主办的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在授课的基础上撰写成《社会哲学概论》一书，由上海书店1924年出版。在这部专著中，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作了重新阐发，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一种宇宙观，其次才是一种历史观。这样一来，他就由唯物史观走向了辩证唯物主义，成为在中国传播和阐发辩证唯物主义的第一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包括宇宙观、本体论的内容？这曾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讨的一大学术问题，而科学与玄学论战又使这一问题更为尖锐化。唯物史观派中的大多数成员对这个问题持否定回答，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唯物史观，不包括宇宙观、本体论的内容。陈独秀认为：“社会科学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哲学（这里所指的是实验主义的及唯物史观的人生哲学，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的哲学）。”^⑥这就把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内容而加以肯定，把本体论、宇宙论作为非“科学”的玄学而予以了拒斥。邓中夏也说：“自从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达之后，哲学的地位已经被这些科学取而代之了。哲学的所谓本体论部分——形而上学，玄学鬼群众藏身之所——已被科学直接的或间接的打得烟消灰灭了。”^⑦他由此把这一看法推向极端，认为：“哲学已是‘寿终正寝’，索性把哲学这一个名辞根本废除，免得玄学鬼像社鼠城狐一样，有所凭借，有所依据。”^⑧李汉俊进而从“唯物史观不是哲学”的主张出发，对唯物史观与哲学的唯物论进行了区分，指出它们有着各自探讨的问题，两者并不是一回事。他说：“有许多人把马克思底‘唯物史观’混为哲学的唯物论，这是绝对

①李达. 现代社会学.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177.

②李达. 现代社会学.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182.

③李达. 现代社会学.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183.

④瞿秋白. 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294.

⑤瞿秋白. 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210.

⑥陈独秀. 《科学与人生观》序//陈独秀著作选: 第2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548.

⑦邓中夏. 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 第2卷.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177.

⑧邓中夏. 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 第2卷.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2: 177.

的错误。唯物史观是论精神如何随社会状态、随生产方法、随生产器具、随劳动、照一定的轨道而进的问题的,哲学的唯物论是肉体与精神、物质与心灵、神与世界的事情的。唯物史观是间或一时期发生若何思想是什么道理的,哲学的唯物论是要解答思想与物质间的关系如何,思想底起源如何的问题的。这两者之间有绝对的区别,是不可互相混同的。”^①他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唯物论”,作为辩证法的思索法和唯物论的观察法的结合,也就是唯物史观;不能“因为唯物史观是由辩证法的思索法和唯物论的观察法结合而成,就误认唯物史观里面的这唯物论的观察法为哲学上的唯物论”^②。

与唯物史观派的其他成员不同,瞿秋白是在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使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受到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深刻影响,打上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印记。普列汉诺夫首先以“现代辩证唯物主义”^③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则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④,他们都力图以“辩证唯物主义”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包括自然观和历史观在内的一般哲学世界观。因此,瞿秋白在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时特别重视辩证唯物主义。1926年,他撰写了《马克思主义之意义》一文,对自己承继的这一哲学传统有过明确表达。这篇文章的开头首先援引了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中提出的著名论断:“马克思主义是整个儿的宇宙观。简而言之,这是现代的唯物论”,然后接着指出:“马克思主义,通常以为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或者阶级斗争论,如此而已。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马克思主义是对于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之统一的观点,统一的方法。何以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及社会观是统一的呢?因为他对于现实世界里的一切现象都以‘现代的’或互辩法的(dialectical)——即第亚力克谛的唯物论观点去解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所谓马克思的哲学。”^⑤这里的“互辩法”,他又译为“互辩律”,今天通译为辩证法;这里的“第亚力克谛的唯物论”,即辩证唯物主义。正是这样,他不赞成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理解为唯物史观,而主张像普列汉诺夫那样,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社会哲学概论》中,瞿秋白虽然没有直接说明自己的思想来源,但实已对辩证唯物主义作了较全面较系统的阐发,涉及哲学的研究对象、哲学的基本问题、唯物主义的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内涵、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的关系诸问题。

瞿秋白指出,哲学的研究不只是对社会历史的思考,更在于“求宇宙根底”,即“统率精神物质各方面的智识而求得一整个儿的宇宙观”^⑥。在他看来,哲学最初不过是一切知识的总称,以后由于科学的发展,各种科学部门相继从哲学中分离出来,至今哲学中所剩的仅是方法论和认识论,这使得哲学具有了综合融贯各门科学知识而成为“一整个儿的宇宙观”的倾向。随着科学进步造成的各门科学知识系统的日益严密,哲学“求宇宙根底”的功夫也愈益深入。在这里,他实际上是从本体论入手来理解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以宇宙根底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瞿秋白十分重视恩格斯揭示的哲学基本问题,以此为了解和把握哲学“求宇宙根底”的钥匙。他指出,哲学在“求宇宙根底”的探索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哲学中之唯心唯物论”^⑦问题;只有从这一问题入手,才能真正了解和把握古往今来的哲学家对宇宙根底所作的各种探求。他说:“人若想哲学问题,——就是他想组合一更稳固的‘宇宙念’(Contemplation de Monde)——他立刻就遇见难题:‘我’与‘非我’的关系,‘认识’与‘实质’以及‘灵魂’与‘自然’的关系。……直到如今,这

①李汉俊.唯物史观不是什么?//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528.

②李汉俊.唯物史观不是什么?//中共一大代表早期文稿选编: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528.

③普列汉诺夫.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496.

④列宁.向报告人提十个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

⑤瞿秋白.马克思主义之意义//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8.普列汉诺夫的这段话今天通用的汉语译文是:“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简单说来,这是现代唯物主义”(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134).

⑥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10.

⑦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10.

一问题还是哲学中的根本问题。”^①正是在这个“哲学中的根本问题”上，各种哲学学派提出了不同的答案，并最终划分为两个基本派别：“一方面的思想家，都以客观为出发点，或者是所谓实质、自然。此等思想家随后就各自解释：怎样于客观之上加以主观，实质之上加以意识，自然之上加以灵魂。因为他们的解释不相同，所以虽然出发点一致而此派哲学系统不尽相同。他一方面的思想家，却以主观为出发点，或者是所谓意识、灵魂。当然此等思想家亦应当解释：怎样于主观之上加以客观，意识之上加以实质，灵魂之上加以自然。他们亦各有解释，而各自创造哲学系统。”^②这样就形成了哲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歧和对立，全部哲学史就是通过这两个基本派别的对立与互动而展开的。在这两派之间以调和论自足的，则形成了哲学上的折衷派。在他看来，只有依靠哲学基本问题这把钥匙，才能进入哲学史的迷宫，从历史上各种“求宇宙根底”的见解中清理出头绪和线索，对这些见解作出正确的把握和回应。

瞿秋白进而着重阐发了唯物主义作为唯心主义对立面根据。他指出，唯物主义对“哲学中的根本问题”的回答，不是来自个别哲学家的主观想法，而是有着哲学史和思想史的根据。他说：“唯物论的学说以为‘不是意识规定实质而是实质规定意识’，并且有哲学史和思想史足以证明。”^③唯物主义之所以在哲学史和思想史上为人们所赞成，就在于唯物主义从客观的物质现象出发，其理论能够通过客观实际得到检验和校正，而唯心主义则从主观的抽象观念出发，其理论不能够通过客观实际得到检验和校正。他说：“人对于宇宙的总概念必须先认明一切现象的根本，然后能明白研究这些现象。若是以唯心论为根本观念，我们的研究便无从校正，——因为‘心’既是一切现象之源，而心却仅只是不可捉摸的抽象的‘观念’。……所以必须就我们所能知道的所能感觉的物质去研究，一切结论可以得而校正；以物质基础的考察，实际状况的调查，来与我们的理论相较，是非正误立刻便可以明白。——因为精神现象发生于物质现象，而物质是可以实际去按察的。——这就是唯物主义。”^④正是这样，他强调在哲学上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

对于古往今来的各种唯物主义，瞿秋白并没有等量齐观，而是认为在诸唯物主义形态中，唯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结合起来，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才能对哲学基本问题作出最正确的说明。由此出发，他从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结合上，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内涵作了多方面阐发，论述了宇宙的起源、生命的发展、物质与意识、善与恶、平等、自由与必然等问题，并着重对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及其联系作了说明。他指出：“宇宙的根本是物质的动，动的根本性质是矛盾——是肯定之否定，是数量质量的互变。社会现象的根本是经济的（生产关系的）动——亦就是‘社会的物质’之互变。所以我们研究社会哲学，应当从经济关系的哲理入手。”^⑤在这里，他突出了矛盾在唯物辩证法中的重要性，指出了辩证法三个规律之间的联系以及辩证法与唯物主义之间的联系，不仅主张用唯物辩证法说明自然世界，而且主张用唯物辩证法说明人类历史和社会现象。

瞿秋白认为，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说明人类历史和社会现象，才能更好地贯彻唯物史观。他指出：“研究社会现象的时候，尤其应当细细的考察这唯物主义的互辩律的(Dialectique)哲学，——他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⑥其所以如此，就在于只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才能从纷繁复杂的人类历史和社会现象中发现其现实的物质基础，并通过这个基础发现社会矛盾及矛盾运动的规律：“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相斗的阶级都是生产和交易之关系的产物。历史的流变有了现实的物质基础。社会的经济关系、经济结构是历史的现实基础，法律、政治、宗教、哲学以及其他思想只是社会的筑物，他们的变迁是随着经济结构而变迁的。”^⑦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便从社会科学这块最后避难地被驱逐出去，人类

① 瞿秋白. 社会哲学概论//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11.

② 瞿秋白. 社会哲学概论//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12.

③ 瞿秋白. 社会哲学概论//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25.

④ 瞿秋白. 社会哲学概论//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33-334.

⑤ 瞿秋白. 社会哲学概论//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57.

⑥ 瞿秋白. 社会哲学概论//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34.

⑦ 瞿秋白. 社会哲学概论//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39.

历史和社会现象由此获得了正确的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以往的乌托邦主义鲜明地区分开来。他说:“旧时的乌托邦主义,虽然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然而不能解释明白他,所以亦没有办法可以颠覆他;他们只能一味的否认资本主义,说他不好。新的宇宙观却给了科学的确定的结论:资本制度与以前的种种经济阶段一样,仅仅是一期间的现象,——生产力的发展及进步的阶级斗争必定能使他败灭。资本制度的秘密发露于剩余价值论,——那是他经济结构里的根基;从此现存制度的‘所以不好’,便得有根本上的分析解释。”^①因此,唯物史观实为辩证唯物主义对人类历史和社会现象的说明。瞿秋白的结论是:“社会哲学——现代的社会之综观及将来的社会之推究,应当:(一)先从哲学上之宇宙根本问题研究起;(二)继之社会现象的秘密之分析;(三)再进于社会主义之解说。”^②这就是说,只有首先说明本体论问题,才能深入说明历史观问题;只有先讲清楚辩证唯物主义,才能讲清楚唯物史观;只有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才能由空想成为科学。这样一来,他就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从逻辑上贯通了起来。

瞿秋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介绍和阐释,使中国人第一次对辩证唯物主义有了直接的了解,更新和深化了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和理解。诚如他在《马克思主义之意义》中所说:“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研究,至今还是异常的贫乏,对于唯物史观的介绍往往不大确切和明了。通常对于唯物史观及马克思主义的译名,即如‘唯物史观’一词都嫌疏陋,马克思的哲学学说决不能以唯物史观概括得了。所以,必须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真切的意义。”^③在以后的历史岁月中,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得到了生动鲜活的发展和丰富,成为与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一种思维方式,直到今天仍然有其巨大的生命力。瞿秋白的开启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九、唯物史观派学术成就的意义

通过上述探讨可以清楚看出,新文化运动中的唯物史观派以革命家兼学问家的双重身份,既在中国革命史上揭开了崭新的篇章,又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重要的成就。他们的学术思想及其贡献,不仅对20世纪中国学术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21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富有积极的启示。

首先,唯物史观派以自己的学术成就,特别是通过对唯物史观的多维度阐释,宣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崛起于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思想世界,进而开启了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这就以一种新形态的现代中国哲学,对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哲学的古今之变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力推进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和传统更新,深刻改变了现代中国的思想空间和学术格局。1933年,艾思奇在《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一文中就对这一思想和学术的新动向作过说明,指出五四运动后,哲学上的史的发展便分成两条平行而又互相斗争的主流,一是堕落的世纪末哲学,一是唯物史观的思潮。在他看来,大革命以后唯物辩证法风靡全国,其力量之大为辛亥革命以来哲学思潮史中所未有,正是以唯物史观在五四运动后成为中国思想世界主潮为其源头和先导的,“我们可以回溯到五四文化运动中去寻找它的萌芽”^④。因此,唯物史观派代表了自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发展起来的新的中国学术方向。唯物史观派对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学术贡献,在这里集中而鲜明地体现出来。

其次,唯物史观派作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集合而成的群体,人数不多,势力单薄,政治上受到反动当局的严酷压迫,思想上又面临与其他思潮的激烈竞争,但却能在学术上写出名著、结出硕果、放射光彩、产生影响,确有值得总结和承继的特点和优点,其中有两个方面尤其值得重视。一是他们具有强烈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不仅堂堂正正地以“唯物史观派”标示出自己的学派和思潮,而且敢于同其他思潮进行思想争论。正是通过问题与主义论战、社会主义问题论战、科学与玄学论战,他们卓有成效地在中国传播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他们具有生动活泼的创造精神,以鲜明的个性化和多样性,从

① 瞿秋白. 社会哲学概论//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39.

② 瞿秋白. 社会哲学概论//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40.

③ 瞿秋白. 马克思主义之意义//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1.

④ 艾思奇. 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艾思奇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5.

学理上对唯物史观展开不同维度的阐释,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开始就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过来的教条而富有生气、充满活力。正是由于这两个特点和优点,使唯物史观派所开启的最初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显示出思想的优势和理论的魅力,能够有效地影响群众、说服群众、掌握群众,从而冲破了政治上的压迫、赢得了思想上的竞争。他们的成功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不敢于与其他思潮进行思想争论,如果在自己内部缺乏个性化和多样性,就会失去生命和活力,就不能得到发展,就会失去群众。这一历史的经验,对今天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事业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再次,唯物史观派所探讨的主要哲学问题、所阐发的许多思想内容,并没有因时过境迁而失去理论的价值和意义。进入 21 世纪后,复兴唯物史观、发展政治哲学以至建设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都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奋点。但这些方面的研究,人们更多的是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求得依据和资源,却很少注意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先驱者们那里找寻自己的传统和来源。其实,唯物史观派的上述学术探索及其成果,如李大钊对历史观的重视和对唯物史观史的疏理,陈独秀对上层建筑的重视和对政治哲学的阐发,蔡和森所开启的唯物史观人类学古史研究维度,李达所建构的唯物史观中国化表述体系,瞿秋白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唯物史观而且更有其宇宙观、本体论,以及毛泽东与蔡和森所思考和探讨的共产党的哲学基础问题,都是今天探讨和阐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忽视的内容,值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后继者们咀嚼和消化、吸取和承继。

正是这样,深入发掘和正确评价唯物史观派的学术思想及其贡献,是今天反思新文化运动、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做好这一工作,才能为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活水源头,也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后继者们从中获取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反之,否定唯物史观派的学术思想及其贡献,势必否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开端,进而否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思想世界主潮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这是一种危害很大的历史虚无主义。

School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LI Weiwu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School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was the group formed by early Chinese Marxists who were both revolutionists and scholars. The chief representatives in this group have academically expounded the concept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LI Dazhao explained it from the dimension of historical science; CHEN Duxiu interpreted it from that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CAI Heshen dwelled upon it in that of researching on the ancient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LI Da constructed the expression system with Chinese style in *Modern Sociology*; QU Qiubai turned the researching dimension from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ll these works ushered in the earliest movement that sinicized Marxist philosophy, taking a new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to advance the change of the Chinese philosophy from the ancient formation to the modern formation, which has represented the new Chinese academic direction developed in the late New Culture Movement.

Key words: School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ew Culture Movement; LI Dazhao; CHEN Duxiu; CAI Hesen; LI Da; QU Qiubai

● 收稿日期:2017-03-01

● 作者地址:李维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3BZX004)

● 责任编辑:涂文迁